

跨国投资与经营丛书

On 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of Hunan:
Opportunities, Risks and
Countermeasures

李一文 / 等著

湖南对外直接 投资论： 机遇、风险与对策



经济科学出版社
Economic Science Press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湖南对外直接投资论：机遇、风险与对策/李一文等著. —北京：经济科学出版社，2010. 11

(国际经济与贸易研究系列丛书)

ISBN 978 - 7 - 5058 - 9694 - 9

I. ①湖… II. ①李… III. ①对外投资：直接投资 - 研究 - 湖南 IV. ①F832. 764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0) 第 138572 号

责任编辑：沙超英

责任校对：刘 昕 杨晓莹

技术编辑：李 鹏

湖南对外直接投资论：机遇、风险与对策

李一文 等著

经济科学出版社出版、发行 新华书店经销

社址：北京市海淀区阜成路甲 28 号 邮编：100142

总编部电话：88191217 发行部电话：88191540

网址：www. esp. com. cn

电子邮件：esp@ esp. com. cn

北京中科印刷有限公司印刷

787 × 1092 16 开 16. 75 印张 330000 字

2010 年 11 月第 1 版 2010 年 11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 - 7 - 5058 - 9694 - 9 定价：32. 00 元

(图书出现印装问题，本社负责调换)

(版权所有 翻印必究)

目 录

第1章 导论 / 1

- 第1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1)
- 第2节 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2)
- 第3节 研究的主要内容及创新 (17)

第1篇 全球视野下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

第2章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综述 / 23

- 第1节 邓宁的投资发展阶段论 (24)
- 第2节 小规模技术理论 (27)
- 第3节 技术地方化理论 (30)
- 第4节 技术创新和产业升级理论 (32)
- 第5节 其他有关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理论及简要评述 (33)
- 第6节 小结 (37)

第3章 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变化与趋势 / 39

- 第1节 国际直接投资的新变化 (39)
- 第2节 国际直接投资的趋势与前景预测 (42)
- 第3节 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新趋势 (48)

第4章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经济意义和趋势 / 54

- 第1节 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具有强大的经济意义 (54)
- 第2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问题和原因 (59)
- 第3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潜力与趋势 (69)
- 第4节 借鉴世界跨国公司经验,调整中国对外直接
投资战略 (75)
- 第5节 后金融危机时代中国企业海外投资面临的机遇、
风险与对策 (80)

第5章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特征 / 87

- 第1节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阶段划分 (88)
- 第2节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规模 (91)
- 第3节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行业分布 (95)
- 第4节 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方式选择 (99)
- 第5节 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地理分布 (100)
- 第6节 小结 (104)

第2篇 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影响效应分析

第6章 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一般性研究 / 109

- 第1节 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历程及现状 (109)
- 第2节 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经验与教训 (113)

第7章 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影响对外贸易的实证研究 / 124

- 第1节 概述 (124)
- 第2节 分析工具及其原理 (125)
- 第3节 分析数据选取 (129)
- 第4节 分析结果 (132)
- 第5节 结论与意义 (138)

第8章 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与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研究 / 141

- 第1节 概述 (141)
- 第2节 分析数据选取 (143)
- 第3节 效应分析 (150)
- 第4节 回归分析方法 (152)
- 第5节 格兰杰因果关系分析 (158)
- 第6节 讨论与结论 (163)

第3篇 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机遇分析**第9章 当前湖南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优势、特点与问题 / 167**

- 第1节 湖南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竞争优势 (167)
- 第2节 当前湖南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突出特点 (172)
- 第3节 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遇到的主要问题 (175)

第10章 当前湖南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外部机遇 / 177

- 第1节 经济全球化趋势带来的外部（国际）机遇 (177)
- 第2节 当前全球金融危机带来的外部机遇 (180)

第11章 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内部（国内）机遇 / 184

- 第1节 中国政府越来越有力的对外投资鼓励政策带来的机遇 (184)
- 第2节 湖南省企业蓄势待发、自身发展带来的机遇 (188)

第4篇 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及其防范**第12章 全球金融危机下湖南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挑战与风险 / 193**

- 第1节 湖南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对的主要挑战 (193)

- 第2节 湖南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面临的主要风险 (202)
- 第3节 世界各国防范对外直接投资风险的一般对策 (207)

第13章 湖南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控制系统研究 / 212

- 第1节 湖南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控制的原则与目标 (212)
- 第2节 湖南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控制的模型 (216)
- 第3节 湖南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预警机制的构建 (224)
- 第4节 湖南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风险机制监控与应用 (228)
- 第5节 建立湖南省企业对外直接投资风险控制机制常态化 (231)

第5篇 促进湖南省对外直接投资的对策

第14章 发达省份和成功对外投资企业对湖南省的借鉴意义 / 239

- 第1节 发达省份采取的有效措施及其借鉴意义 (239)
- 第2节 国内成功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借鉴意义 (240)
- 第3节 推动湖南省境外直接投资的新战略 (243)

第15章 湖南省企业发展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建议 / 245

- 第1节 政府方面应采取的对策 (247)
- 第2节 企业方面应采取的对策 (252)
- 第3节 行业和中介机构方面应采取的对策 (255)

参考文献 / 260

导 论

第1节 研究背景及研究意义

中国是世界上最大的发展中国家，外国直接投资已成为世界经济波动影响我国经济增长的重要经济变量。中国不仅要引进来，而且要走出去，应积极参与全球范围内生产要素的优化配置，实现由单纯的资本输入向资本输出与输入相平衡的战略转移。这是克服国内资源矛盾、打破贸易保护的现实需要，也是利用两个资源、开拓两个市场、学会两种本领的客观需要。

实际上，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条件已基本成熟。首先，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经济已经从卖方市场转向买方市场。目前，国内家电、纺织、重化工和轻工等行业已普遍出现了生产能力过剩、产品积压、技术设备闲置等问题，这些行业要想获得进一步的发展，就必须寻找新的市场。通过对外投资，变商品输出为资本输出，在国外投资建厂，建立销售网络和售后服务网点，就可以带动国产设备、原材料以及半成品的出口，有效地拓展国际市场。其次，“入世”在给中国企业带来压力的同时，也为中国企业走出去提供了良好的条件。因为“入世”后中国企业面临的义务和挑战主要体现在国内，所获得的权利和机遇则主要体现在国外，即体现在外国向中国的产品、服务和投资更大程度地开放市场和实行国民待遇方面。也就是说，中国企业要想享受“入世”后的权利和机遇，就要尽可能地向海外进军。最后，从企业国际化道路的一般进程来说，先是发展间接出口，如通过专业的外贸进出口公司进出口商品或服务，而后是直接出口，如企业内部设置专门机构或进出口部门来处理相应的业务，最终再发展到对外直接投资。中国改革开放以来，国际贸易方面获得的巨大成就，为中国企业进一步进行对外直接投资提供了必要的物质基础。

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2006年10月发布了《2006年世界投资报告》。中国位列第17大对外投资国。截至2006年6月底，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累计净额达636.4亿美元，累计成立境外投资企业9900多家，分布在全球近170个国家和地区。最

大的投资流向地亚洲,占当年投资流量的 54.6%。其次是非洲国家,投资行业主要流向采矿业、商务服务业、制造业及批发和零售业。中国对外投资的确有了长足的发展,但是和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在国际上,发达国家吸引外资和对外投资的比例一般是 1:1.2 到 1:1.4 之间;而发展中国家的这一比例一般是在 1:0.2 到 1:0.43 之间。中国连这一水平都未达到,因此还远不是一个对外投资大国。

加快实施“走出去”战略,是我国在新一轮对外开放中的一项重要战略决策。鼓励湖南省企业“走出去”也是湖南省委、省政府新的重大举措。2008 年 8 月 15 日湖南省商务厅正式公布了《湖南省商务“十一五”规划(2006~2010)》,明确提出:要“立足我省省情和发展要求,采取有效措施,积极稳妥地实施‘走出去’战略,向外拓展发展空间”。

在新形势的推动下,近几年来湖南省企业对外投资步伐明显加快。截至 2007 年 6 月底,湖南省境外投资设立企业达到 124 个。仅 2008 年 1~6 月就新批境外投资企业 24 个,合同投资额 19565.6 万美元,中方投资额 18751.59 万美元。与此同时,湖南省企业大步流星“走出去”,主动融入国际产业阵营,表现出了非凡的胆识和力量。截至 2009 年 8 月,湖南省共核准境外企业 278 家,到境外投资的湘籍企业呈快速增加趋势。湖南省长丰集团与广东广汽集团实行战略重组,成为国家十大产业调整振兴规划出台后首个成功重组的案例;华菱集团成功收购澳大利亚铁矿石企业 FMG 集团 17.34% 的股份,成为迄今为止湖南省最大的并购项目;三一重工在德国投资 1 亿欧元设立工业园,成为迄今为止中国在欧洲最大的一笔实业投资项目;中联重科收购意大利 CIFA 公司,跃居全球最大的混凝土工程机械制造供应商;株洲南车时代公司成功引进 IGBT 生产核心技术,填补了国内空白。

但与此同时,湖南省在对外投资中也出现了一些亟待解决的问题,如经营主体实力不强,经营困难;同一市场恶性竞争;中小企业抗风险能力差;人员素质有待提高,等等。如何推动湖南省企业更稳健地“走出去”?此前湖南省诸多企业对外投资的经验教训有哪些?如何建立对外投资保障机制,规避经营风险?对上述问题进行深入的、多视角的探讨,不仅对湖南省企业对外投资具有很好的指导意义,在一定程度也可以丰富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理论。

第 2 节 本课题国内外研究现状述评

一、国外研究现状述评

从 20 世纪 70 年代中期开始,一些学者逐渐关注对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

的理论探讨,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和观点。研究主要集中在如下方面:

1. 对国际直接投资动因、过程和动向的分析

(1) 对发展中国家直接投资动因的探索。

美国经济学家韦尔斯(Wells, 1983)提出了小规模技术理论。小规模技术理论认为,发展中国家的企业拥有为小市场服务的生产技术,这些技术具有劳动密集型的特征,成本较低,灵活性较高,特别适合小批量生产,能够满足低收入国家制成品市场的需要。而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拥有的大规模生产技术在这种市场无法获得规模效益,发展中国家企业可以利用其小规模生产技术在竞争中获得优势。理论还指出种族纽带和民族文化的特点是发展中国家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优势。拉奥(Lall, 1983)在对印度跨国公司竞争优势进行分析后提出了技术地方化理论,他认为,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的技术引进并不是被动的模仿和复制,而是进行了改造、消化和创新,这种创新活动使引进的技术更加适合发展中国家的经济条件 and 需求,不同于从发达国家引进的源技术。英国学者甘特韦尔和托伦蒂诺(Cantwell and Tolentino, 1990)提出了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技术创新升级理论,用以解释20世纪80年代以来发展中国家对经济发达国家的直接投资加速增长的趋势。他们认为,技术积累对任何国家都具有促进经济发展的作用,技术创新是一国产业和企业发展的根本动力。与发达国家不同,发展中国家企业在技术创新方面的优势主要是利用特有的学习经验和组织能力,掌握和开发现有技术。因此,随着时间的推移和技术累积效应的发挥,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产业分布和地理分布也随之变化,并且可以预测。勒克罗(Lecraw, 1993)考察了印度尼西亚在1986~1990年企业的FDI行为,发现有两方面的原因促使企业进行FDI。一是为了占领国际市场,即市场经营的国际延伸;二是为了提高母公司的产品出口,即通过投资获取东道国的先进技术或管理技能从而促进母公司的产品出口。夏皮罗(Shapiro et al., 2003)以国际生产折中理论为分析基础,对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和西方典型跨国公司进行了对比,结果显示:在强调私人关系网络的市场环境中进行谈判和做生意的能力是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独特所有权优势来源,因此,中国跨国公司在亚洲的盈利能力要强过西方跨国公司。这也解释了中国家族式跨国公司为什么在亚洲地区选择有“关系”背景的合作伙伴,而在亚洲地区之外选择能力上能够互补的合作伙伴。

(2) 对中小企业直接投资动因的探索。

陈和敏等(Homin Chen and Tain-Jy Chen, 1998)通过对中国台湾企业的行为分析,指出中小型企业更热衷于外部网络联系,利用网络资源可以弥补中小型企业进行FDI时缺乏内部化资源的能力不足。里施和奈特(Liesch and Knight, 1999)从信息和知识获得角度对中小型企业国际化进行分析,得出中小型企业

在国际化之前就具有了信息内部化的优势。网络联系和其他战略伙伴关系等非传统等级组织形式也同样构成中小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另外,中小型企业固有的优势使其更富有创造性,更容易接近顾客,更快面对新技术以及顾客特殊需要,在整个公司内部更易有效地形成内部化的信息。什等(Shi et al., 2001)考察了中国香港小企业在内地投资行为和模式,认为组织劳动密集型产品生产的隐性经验和某些社会联系是这些小企业竞争优势的来源。

(3) 各种因素与企业直接投资动因关系。

拉奥(Lall, 1999)利用印度及其他发展中国家1985~1995年的数据进行对比分析之后指出,由于缺乏训练有素的劳动力、交易成本高、政策透明度低、基础设施差等要素,因此,在高新技术产品的领域发展中国家对FDI的吸引力较弱,区位优势不强,这一结论既为判断高新技术行业的FDI的流向提供了依据,又同时指出FDI的诱发因素。哈默斯(Harms, 2002)利用1987~1995年间55个发展中国家的数据分析得出政治风险对FDI流入有显著的影响。福斯特(Foster, 2003)通过对土耳其情况的分析验证了工业基础薄弱、政治不稳定、高通胀率及腐败对外资流入的负面影响。埃尔德逊(Alderson, 2004)分析了17个经合组织国家的情况,得出的结论表明,政府的社会民主控制程度、罢工强度和工会密度对一个国家向外投资流量的大小具有积极的影响。

(4) 国际投资过程和动向的分析。

约翰逊和瓦内尔(Johanson & Vahlne, 1977)对瑞典公司国际化进程的研究表明在发展国际化经营过程中通常是通过两种方式而不断增进:渗透水平模式和区位选择。即倾向于先通过代理人的方式出口商品进行他们的国际化,下一步是建立一个销售分支,最终建立起一个制造分支。区位选择即指投资从与本国在语言、教育、商业惯例、文化以及工业化水平等方面存在的差异化程度小的国家或地区进行,然后依次向外扩散。波特(Porter, 1990)在系统总结约翰·史多福和路易斯·威尔(John Stopford and Louis Wells)等人的研究基础上,提出了著名的战略管理理论,其理论关注的是跨国公司发展机制问题,从而大大激发了对有关理论问题,如跨国公司的定义、组织结构、战略活动等的重新认识,显示了新的理论发展空间。克鲁格曼(Krugman, 1991)、邓宁(Dunning, 1995)、德莫特·巴夫林(Dermot Paveilin, 2001)等从理论上研究了聚集效应的影响。科古等(Kogut and Chang, 1996)等利用国别数据也得出类似的结论。李普齐(Lipsey, 2000)对发达国家的外资流向与产业结构做了研究,分析了具体产业对外资的吸引力。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由日本学者小泽辉智(Ozawa)提出,一体化国际投资发展论是一种非OLI范式的FDI宏观动态模式,它竭力把跨国公司对经济增长的推动作用与开放的经济发展理论结合在一起,试图用一种一体化的理论解释当经济发展到一定阶段时,发展中国家如何建立自己的跨国公司去促

进经济转型,以及这一过程的实现机制。科弗林和塞别夫(Coughlin & Sebev, 2000)研究最大的一个特点就是将FDI的区域差异作为一个独立解释变量加入到已有的多元回归检验模型。采用虚拟变量法,科弗林和塞别夫的研究结果表明,FDI的区域分布如同经济实力、人均生产率这类指标一样显著地决定着FDI的流向与规模。兰姆和里施(Lamb and Liesch, 2002)选取了澳大利亚的两家小企业作为案例对象进行研究,他们发现原来所认为的国际化过程中的市场投入、市场知识和市场参与三者之间的单向顺序关系存在问题,这三个国际化过程中的结构性因素之间存在着双向网络化的关系,因此,小企业的国际化过程也就表现为一个成长与学习的动态过程。李(Li, 2004)在将经验学习、系统计划模型和权变观点整合的基础上提出了一个国际化过程的复合模型。

2. 对国际直接投资影响和经济后果的研究

国际直接投资的影响力是广泛的,不仅对东道国有多方面的影响,而且对母国也同样如此。

(1) 投资与国际贸易的关系。

投资与贸易的关系最初由孟德尔(Mundell, 1957)提出。马库逊和迈尔文(Markuson and Melvin, 1983)利用非要素比例模型阐述了要素流动与商品贸易之间的互补关系。马库逊和史文生(Markuson and Svensson, 1985)利用要素比例模型,指出商品贸易和投资之间是替代还是互补的关系取决于贸易和非贸易要素之间“合作”与“非合作”的关系。赫尔普曼(Helpman, 1984)、赫尔普曼和克鲁格曼(Helpman and Krugman, 1985)指出,由于存在要素禀赋不对称和规模报酬递增的情况,跨国公司的专有资产很难通过外部市场达成交易,因此大量的内部贸易行为和中间产品的需求会产生,从而带动母国的出口贸易。贝尔德波斯和斯鲁维根(Belderbos and Sleuwaegen, 1996)利用公司层面的数据发现:当目标市场处于贸易保护的情况下,投资与贸易之间存在着替代关系,如史文生(Svenson, 1997)对日本汽车企业研究发现:在美国投资生产汽车,却从本国进口大量的零部件。巴格瓦蒂(Bhagwati, 1987)和迪鲁珀罗斯(Dinopoulos, 1991)等从政治经济学的角度对贸易与投资之间的相互关系进行研究,提出了补偿投资或者化解关税投资的概念。迪鲁珀罗斯等人(Dinopoulos et al., 1986、1989、1991)从寡头竞争和企业层面的角度对补偿投资做了进一步研究,揭示出口国家的企业如何利用补偿投资来化解潜在的保护威胁,并讨论了补偿投资对两个国家的福利影响。

(2) 投资与技术的关系。

内底里(Nediri, 1991)、伊布里安尼和雷格纳特(Imbriani & Reganat, 1997)对澳大利亚、加拿大以及欧洲国家的检验结果均表明,外资企业对当地

企业产生明显的外溢效应。布兰斯特特尔 (Branstetter, 2001) 对美国、日本双向投资检验结果也发现存在显著的双向外溢效应。然而, 对发展中国家的 FDI 技术外溢效应假设检验却难以得到一致性的结论, 布鲁姆斯特罗和佩尔森 (Blomstrom & Persson, 1983)、布鲁姆斯特罗和沃尔夫 (Blomstrom & Wolff, 1989)、科科和泽简 (Kokko & Zejan, 1994)、科科 (Kokko, 1996)、西胡尔姆 (Sjoholm, 1999) 等人分别发现 FDI 技术外溢效应假设在乌拉圭、印度尼西亚、墨西哥等国成立; 但是布鲁姆斯特罗 (Blomstrom, 1986)、哈达德和哈里森 (Haddad & Harrison, 1993)、科科 (Kokko, 1994)、戈尔达 (Goldar, 1994)、哈克撒 (Haksar, 1995)、爱特坎和哈里森 (Aitken & Harrison, 1999) 对委内瑞拉、墨西哥、印度等发展中国家的检验结果却不支持 FDI 技术外溢假设, 或者发现 FDI 的技术外溢效应只在一定条件下成立。

科亨和莱文索尔 (Cohen & Levinthal, 1989) 在分析企业研发作用时首次提出了“吸收能力”的概念, 阿布拉姆维茨 (Abramovitz, 1986) 的“社会能力学说”持有类似观点: 为了获取外部的技术成果, 一个国家、企业必须首先拥有足够的基础设施、技术水平等基本条件。伯仁斯坦 (Borenstein) 等人的研究说明了单纯的 FDI 流入并不直接导致技术溢出效应, FDI 是否能促进东道国经济的技术进步归根结底还得取决于东道国吸收能力。凯勒 (Keller, 1996)、徐 (Xu, 1999) 证实了如果东道国缺乏一定的吸收能力 (人力资本储量), 则 FDI 流入并不直接推动经济增长。罗西 (Rozeue, 2000) 则通过考察流入我国农业部门的外资与农业技术变化间的关系来验证引入外资是否可视为一种生产技术方式的进口。陈和民和谷英华 (Tain-Jy Chen, Homin Chen & Ying-Hua Ku, 2004) 按照以扩展东道国的企业特有优势为目的的“扩展型”FDI 和寻求东道国廉价劳动力为目的的“防御型”FDI 的分类标准, 研究了流入我国台湾的 FDI 是否增强或削弱了台湾当地企业的竞争能力。

从以上的综述中不难看出, 中小企业和发展中国家这两类群体将成为关注的对象。同时, 对跨国公司 FDI 所带来的后果和影响 FDI 因素会是这一领域的研究热点。实践不止, 理论之树常青, 相信随着世界经济的不断发展和跨国公司经济活动的不断创新, 尤其是随着发展中国家跨国公司的不断涌现和中小企业国际化的进程, 国际直接投资和跨国公司理论会不断被完善和突破, 对经济现实的解释力也会不断增强。

3. 对中国对外投资的研究

从 20 世纪 90 年代末期开始, 随着中国国家领导人明确提出中国企业“走出去”战略, 国际经济学界的理论与实证分析开始关注中国的对外投资, 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理论和观点, 对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提出了新的挑战。有

关的研究主要集中在以下几个方面:

(1) 中国对外投资的重要性研究。

约翰·邓宁教授(2006)就国际投资的新主体、新动机、中国对外投资的现状、对中国对外投资进行研究的重要性以及对中国政府的启示等问题进行了探讨。

邓宁认为,随着经济全球化进程的加快,中国日益成为全球经济组织的重要参与者,在国际经济舞台上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进入了一个加速发展的新阶段,中国经济正在更加完善地融入全球经济体系。据联合国贸发会议(UNCTAD)统计,2004年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存量达到了388亿美元,位居发展中国家前列,其区位分布、国别分布等也呈现出多样化的特点。像中国这样的发展中国家正在逐渐地涌现为对外投资活动的新主体。尽管发展中国家占对外投资的比重没有很大的变化,从1980~2004年一直保持在11%左右,但是其投资金额有了很大幅度的增长,由602亿美元增加到10357亿美元。邓宁教授指出,随着经济体系的完善性和技术水平的成熟性,与备受各界关注的引进外资相比,对外直接投资很有可能在下一个10年间显著增长。

发展中国家作为对外投资的新主体,在投资区位选择和投资方式上与发达国家相比有所不同,用传统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已经难以做出解释。中国FDI的地域分布,高度集中于美国、加拿大以及澳大利亚等国家,这就否定了主流国际直接投资理论的观点,即东道国和母国之间在经济和地理上的相近性,在国际投资区位选择中具有决定性作用。邓宁教授也认为,2001年以前,发展中国家的对外投资活动主要以绿地投资为主,而自2002年以来,则主要以并购方式涌入发达国家。更多的并购和跨国策略联盟将很有可能在发展中国家间出现。同时,在投资动机方面,各个东道国也不尽相同。中国主要是追求广阔的市场和丰富的自然资源,近年来,逐渐向寻求技术和树立品牌方面过渡。东道国的经济增长和世界经济区域一体化的扩大和形成将成为主要的决定因素,从而影响新成员的对外直接投资。

邓宁教授还指出,在并购投资热潮中,随着区位选择和产业分布的多样化,发展中国家与发达国家跨国公司在并购的获益方面更加接近。他们通过投资可以获得各种有形或无形的资产,诸如技术、品牌、知名度等,但是发展中国家的并购仍然存在着文化和社会背景差异等种种进入壁垒,面临着汇率浮动和政治动荡等风险。因此,对发展中国家而言,无论是引进外资还是对外投资,都应该被看做是国内工业结构改革和增强企业核心竞争力的重要因素。作为发展中的大国,中国历经经济体制转轨并具有不同的文化背景,在并购行为中有很多不同于美国等发达国家的方面,而主流的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又恰恰认为美国才是参与投资的主体,因此,对中国的相关研究具有非常重要的理论和现实意义。中国应该积极主动地融入

到全球化的经济体系中来,以迎接当代全球经济所带来的机遇和挑战。

(2) 对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状况和动机的研究。

比利时安特卫普国际管理与发展中心(CIMDA)主任丹尼尔·封·登·布尔克教授(2006),以欧洲为东道国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为研究对象,基于20世纪80年代到2005年的中国对外直接投资存量、流量、占全球总数的百分比、与其他国家的比较等数据,研究了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现状及重要性。认为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有了飞速的发展,但是与世界总数以及其他发达国家相比仍然处于较低的水平。

通过分析中国对外直接投资中行业分布情况和投资目标地区的分布情况,以及中国前50强跨国公司的优先选择地区分布,认为投资中自然资源的地位提升,主要向亚洲地区投资,只有少部分投向欧洲地区。通过比较中国公司对于国际拓展动机,比如规避风险、寻求生产材料资源、促进生产、环境保护、扩展市场、引进生产与管理技术等,最终比较结果为寻求新的市场、新技术、新专业技巧,寻求法律帮助与政策支持是排在前例的动机。

而对于中国公司对外直接投资的进入模式主要有四种,分别是独资、占多数股份、占少数股份和对等资金,中国公司对外投资中这四类分别占了29%、56%、12%和3%。数据表明,在中国跨国公司的进入模式中,还是以前两种为主。

总之,与世界水平相比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才刚刚起步,但正在飞速发展,大多数中国海外投资者以技术、品牌和资源动机为主,而且欧洲并没有成为中国大型企业的投资首选地。

同样是对中国对欧洲直接投资的研究,芬兰图尔库经济学院泛欧中心的瓦尔特里·卡尔特莫研究员(2006),从中国在波罗的海地区的对外直接投资动机角度进行了一定的定性研究。

文章对中国的投资进行了定性研究,并且结合各种资源,对中国在波罗的海地区投资动机做出最为可靠与精确的描绘,详细介绍了COSCO、AIRCHINA、CHERY、ZTE、HUAWEI等典型跨国企业的案例、中国企业在俄罗斯的投资和在瑞典的研发投资以及中国企业在德国的投资动机,等等。

基于翔实的调查结论,瓦尔特里研究员认为在现有竞争型资源的利用方面,在波罗地海地区的大部分中国企业一般仍主要从事贸易活动,而且中国企业对区域市场和客户基础比较感兴趣。在新的竞争型资源的开发方面,除了中国公司已通过区域内的跨国公司获得的专业技术,他们还开始投入建立自己的研发实验室,与当地企业的合作更加便捷,但是中国企业看上去对波罗的海的自然资源不太感兴趣,中国在该区域内的有些不成功的获得主要是使得国际广泛识别的商标内部化,中国投资的动机主要是由于企业认为在该地区对于某产业的运作比原产

国更有优势。

日本环日本海经济研究所经济交流部的筑波昌之(2006)对日本吸引外资促进政策的进展及中国对日投资现状、中国企业对日投资及日本地方政府相应积极举措进行了理论结合实践的分析。他认为,中国企业对日投资的增加,除了中国经济持续高速增长带来的综合实力扩大和企业成长壮大带来的投资能力增强外,中日经贸屡创新高,互动趋势增强也是其中的关键因素。他在综合分析了日本政府和地方政府的招商力度与方式以及中国企业对日投资的成功案例的前提下,认为中国企业在日本的投资是大有可为的。

(3) 中国对外投资对传统对外直接投资理论的影响研究。

随着发展中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发展,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已经不足以解释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特别是中国对发达国家的投资现象,国外许多学者针对这一问题展开了讨论。

惠灵顿维多利亚大学乔安娜(Joanna, 2006)在“转型国家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中主要探讨在中国这样的转型经济环境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企业的独特特点;分析在几乎没有所有权优势的条件下,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目的何在;对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提出假设,并根据国际投资学术成果提出其理论依据。传统的对外直接投资理论认为企业必须具备了 OLI 三种优势时企业才会进行 FDI,但是这种理论已明显不能解释中国企业对外 FDI 的事实。中国各种所有制形式的企业都普遍缺乏所有权优势(竞争能力、技术水平和经验等),因此他们侧重于资源获取型的对外直接投资,并渴望通过企业内部市场的整合达到提升竞争力的目的。作者认为,中国对外 FDI 与 OLI 之间不是单纯的直线关系,它们可以相互作用。

文章把国内制度因素和国外资源条件结合起来,从新的视角来分析中国企业对外直接投资的决定因素,对国际直接投资理论做出补充,尤其对研究发展中国家对发达国家 FDI 做出一定贡献,相信在实证分析完成后,文章会更有说服力。

英国利兹大学商学院教授巴克利和沃斯(Buckley and Voss, 2006)利用独特的政府机构数据集,对中国 ODI 数据(1979~2001 年)做了计量经济学分析。他们在“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东道国区位决定因素”中设计了很多经济和政治的相关变量,以研究中国 ODI 在多大程度上可以被传统的 FDI 和跨国公司理论所解释,希望推进对中国跨国公司的研究议程。

在模型设计中,作者采用中国投资者用于特定海外项目的外汇总值作为因变量;自变量包括市场规模、市场增长、汇率、与中国的贸易强度、地理、通货膨胀、政治风险、自然资源禀赋、市场开放程度、政策方向、东道国是否是 OECD 国家等。统计分析结果显示:1992 年之前,中国 ODI 关键的区位决定因素是市场规模与中国的地理距离、通货膨胀、市场开放性;1992 年之后关键的区位决

定因素变成贸易强度（进出口）、政治风险、自然资源禀赋；对 OECD 国家投资的关键决定因素是市场规模、汇率（人民币相关汇率的贬值增加了中国的 ODI）、地理距离（FDI 在某个距离替代了贸易）、自然资源禀赋；对于非 OECD 国家，关键区位决定因素是中国的出口、市场开放性。从而作者认为国际化决策在中国跨国公司可能比在发达国家跨国公司更有特性；区位决定因素随时间发生了变化，这有可能意味着中国跨国公司国际化程度加强；应该把政府政策、制度和母国条件更好地整合到解释中国跨国公司的理论中去。

作者对影响中国 ODI 的区位决定因素做了详细分析，而且考虑到中国本身具备劳动力成本优势的特点，海外市场的选择不会是基于寻求最低成本，所以没有把劳动力作为一个解释变量，具有科学性和严谨性。但是中国对外直接投资的政策、制度和体制影响因素还有很多，市场自由化和经济改革对中国 ODI 都会产生一定的影响，这些问题还需要以后深入研究。

尽管国际学术界持续关注中国的对外投资，且成果累累，但相对于对中国引进外资的研究而言，中国企业的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活动，尚没有得到国际学术界的足够关注；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和跨国经营的广度、格局、决定因素及其影响等诸多重要问题，尚缺乏深入系统的认识，特别是对中国特定区域的对外投资活动更缺乏基础的研究。显而易见，国际学术界对有关湖南省企业对外投资的研究几近空白也就不足为怪了，因此，相对国外的研究状况，本课题的研究具有一定的独创性。

二、国内研究现状述评

中国的对外投资，是伴随着中国经济体制转轨和现代化进程而逐步产生和发展的。随着中国对外投资的迅速发展，国内学术界越来越多地关注和研究中国对外投资方面的问题，有关著述似可谓汗牛充栋，俯拾皆是。现有的研究成果主要集中于以下两个方面：

1. 对中国对外投资活动方面的研究

中国学者在对外直接投资方面的研究，首先表现为对中国的对外直接投资发展状况和趋势进行实证分析，考察其对外直接投资的动因、主体、优势、投资方式、区位选择、行业选择、与贸易的关系及影响因素，等等。

（1）关于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动机。

刘新民（1999）将海尔进军美国的动机总结为：进一步开拓国际市场，实施名牌战略；有效地规避国际贸易中的非关税壁垒；充分利用当地技术、人力、资本等优势。

祝建民（2000）认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宏观上的战略动机是：占领国际市

场、分享国际资源、发展壮大跨国公司与发达国家经济相抗衡；微观上的战略动机是：追求风险调整后的收益最大化。综合微、宏观的战略动机，我国各产业的比较优势各有千秋，对外投资区域呈放射状扩散，既可投向发展中国家，又可投向发达国家。因此，我国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不是单一的，而是多种不同动机的有机整合。总结起来，他认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有以下几种动机：扩大出口；技术创新；促进结构调整，产业升级；开发、利用国际资源。迟红娟（2001）认为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源于：一是为企业融资提供保障；二是为企业生存和发展拓展更广阔的空间；三是中小企业可以寻找国外低竞争环境，避免国内激烈竞争，从而扩大销售收入和利润，提高市场占有率；四是跨国经营更加有助于中小企业无形资产的积蓄；五是跨国经营迫使中小企业管理工作逐步正规化。韩琪（2001）则从缩小“资本流出缺口”角度，提出了对外直接投资的动机。顾乃康则把中央政府推进跨国经营的动机总结为弥补国家资源缺口和推进国际化经营企业集团的形成。张为付（2006）分析了中国企业对外投资的动机，概括为追求大市场、低成本、高技术和战略选择四种动机。

（2）关于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分析。

冯赫（1998）认为，中国对外投资的主体是企业。在“走出去”战略实施过程中，一些人有意无意模糊了这一概念，将政府对外投资的管理职能上升到对企业经营行为的影响与干预，给“走出去”抹上了不应有的行政指令色彩。政府作为公共管理部门，对“走出去”的职责就是为企业创造良好的政策环境和提供必要的信息服务，绝不能“越俎代庖”，偏离轨道。李健宁（1999）认为，需要破解认识上的误区。第一个误区是，认为对外投资是大企业的事，因为他们实力强，而国际经验告诉我们，大企业和小企业都可以对外投资，只是方式不同，项目性质和规模不同；第二个误区是，我们总认为跨国公司一定就是大公司，其实不然。魏杰（1999）认为，“走出去”的主体是企业，而不是政府。因此，政府在“走出去”的战略中，要清楚自己的功能，不能取代企业而自己“走出去”。对外投资的主体究竟是国有企业，还是民营企业？有人认为“走出去”首先是国有企业走出去，这种观点是不确切的。“走出去”的主体的确定，不是按企业的所有制性质定，而是看企业是否具有比较竞争优势。比较竞争优势是“走出去”的主体的唯一判断标准，任何具有比较竞争优势的企业都可以“走出去”。“走出去”是一种政绩表现，还是企业的自主选择行为？“走出去”并不是政府的政绩表现，而是企业根据盈利与成本的相关关系，进行收益与风险选择的经营行为。例如，一个企业究竟是搞产品输出，还是搞资本输出，关键是取决于企业自身的利益选择。如果企业在国内经营有利，那么它就不一定非要“走出去”，“走出去”是利益选择，而不是为了“走出去”而“走出去”。

张维迎（2002）认为靠国有企业来实现中国的资本输出几乎是不可能的，